

歷史上的兩種游於藝

吳展良*

今人所說的「游於藝」多屬宋代以後的意涵，與修身養性密切相關，主要透過書本文章、詩詞歌賦、琴棋書畫等種種知識與藝能，來提高個人的能力、生命境界及身、心、靈狀態，也兼有娛樂的功能。這固然與西方 Art 的概念有所不同，但也已經不是古典的意義了。孔子說：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游於藝。」此所謂藝，究竟所指為何？鄭玄以降的註家大抵都解釋為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，這個說法應該頗能表現古代士大夫教育的真實情形。要而言之，此六種藝能原先的功用，乃是為了培養貴族與國家社會領導人才應具備的本領。

一、培養貴族與領導人才的游於藝

周代文化以禮樂為核心。禮是宗教、政治、社會乃至經濟、文化等各領域的整體規範，它包攝天、地、人，是古代世界秩序的基礎。樂本為祭祀所用，非後人所認知的音樂，其主要精神為「和」，重視天、地、人之間的相互感通。古人學禮樂在辟雍，辟雍同時也是祭祀之所。學習禮樂，一方面能培養治國平天下的格局，另一方面則知如何上順乎天、下應乎人。禮有「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」五禮；樂有「黃帝、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武王」等六代之樂，以此立起一個政教合一的系統。六樂還必須配六舞，由選中的國子（貴族子弟）演出，六代樂舞直傳到清代，歷朝均用之於重大典禮，以顯示其政治的正統性與合法性。禮樂之外，射屬於競技，能夠鍛鍊領導者的體魄、英氣及精密度；御則使人在對馬與車的馴駕過程中，深刻瞭解並掌握事物乃至內外世界的脈動。射與御都能培養人精確地駕馭自己

* 吳展良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。

身體及外在事物及環境的能力，由此而通於領導統御的道理。禮樂偏於文，射御則偏於武，古人重視文武兼備，禮、樂、射、御乃是古典貴族教育的核心，近現代歐洲的貴族教育對此也頗為重視。相對於禮、樂、射、御等大藝，書與數則為小藝。書有二說：一為識字、寫字，一為文字學上所說的六書；數亦有二說：一為九九乘法表，一為計量田畝、稅賦之事。後代之所重，反而在從書、數等衍生出來的書本知識、詩詞歌賦之類，如此則不免偏於文弱。

孔子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道至大而不可言，包含著安頓一切的本領與素養；德則是有得於我者，不僅是後世強調的內心修養，而且包含待人處事的風範儀型，是內外兼修的；仁為孔門論學宗旨，著重人與人之間本於真情的相處之道，亦為人我、內外兼盡之事。藝雖然列在最後，但其精神目標則通向前三者；古人透過六藝的教育，能夠養成領導者的器局與風度。故所謂游於藝，實貫徹於上順乎天、下應乎人的做人處事以及安邦定國之道。

二、平民社會及佛道的轉化

封建社會垮了以後，漢初平民起義，早期用黃老之術治國，至武帝始行儒術，人才多由民間出。雖然在政治與社會文化上仍頗有貴族與士族社會的遺留，但已由先秦的貴族社會開始向平民社會轉化。此時六藝的內容也出現很大的改變。

將六經稱為六藝，始於漢初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劉向等儒生，他們為了尋求治理國家社會的大藍圖而塑造、強調了「經」的概念，同時「變經為藝，變學為術」，以爭取「儒術」的主導地位。在周朝還興盛之時，所謂經典就是生活，必待禮崩樂壞之後，才需要將古人「得位行道之跡」作為政教典範而記載下來，故「經」是戰國中晚期以後才形成的概念。漢初之人將六經與六藝混說，一方面主動爭取到獨尊儒術的地位，但所謂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等六藝的學習，卻變成了「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」等六經的學習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，由於此一轉變，漢朝人的「游於藝」，遂成為通經致用的經學概念，雖多少保留了培養領導人才的意涵，卻已不再是古代的貴族教育。而「經」在三代本與生活為一體，此時則被人拿來作為古聖王遺範加以誦讀研究，若從儒學本身的角度來看，則斯道已衰矣！這是先秦至兩漢的一大變化。

魏晉時期，竹林七賢等名士多具有文學藝術的極高天賦，但此種「游於藝」已

經漸漸遠離政治而受到道、佛的影響。本來「游於藝」是用於政治的，到了此時遂逐漸自然化、個人化，而以追求個體生命的修養與完成為目標了。唐代詩歌文學與佛、道二教皆大盛，獨儒門淡泊，藝的內涵持續轉化，而逐漸成為後世所見以個人修養為中心的「游於藝」。

三、道藝化的游於藝

宋代以下以個人修養為中心的「游於藝」，一則偏重以書本、典籍為中心的研習，一則為後人所熟悉的詩詞歌賦與琴棋書畫。宋儒雖有很強的士人自覺，希望將游藝的修為結合到治國平天下來，但畢竟已缺少完整的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的教育。宋初雖曾希望恢復古禮古樂，如仁宗召見胡瑗，旁人擔心其為平民而不懂禮，胡瑗則謂其一生所習皆此，其後果然動容周旋中禮。胡瑗是宋代教育的開山人物，奠定了無論官學乃至民間書院的教育規模，故宋儒亦皆習禮樂。然而古禮古樂畢竟已難復興，宋人的禮樂只是一種追摹想像，雖不無提升器局之效，然距離古代作為政教核心且融入生活的禮樂已遠。明又不如宋，到了清代更已成為具文。有清之禮學雖甚為發達，卻只是紙片上的學問，不能真正有為，因此到了清末國事岌岌之時，難以有具備領袖氣質的人物出來主持大局。反而西方十九世紀以降的貴族或領導階層，能夠受到文武兼備的全人教育之陶養。中西近世實力的消長，可謂其來有自。

傳統的「游於藝」，上而能造就治國平天下的領導人才，下而能培養出一個完整的人。宋以下的「游於藝」，精神已偏於內向及個人。雖然如此，宋代以降文人化的「游於藝」依然繼承了古典的精神，強調完整人格的培養與境界、格局的提升。無論書籍的研讀，以及詩詞歌賦、琴棋書畫乃至武術方技均主張由游藝而進於道，從修身養性到通乎天地人生之至理。其中大有可觀，遠非今日的專業技能或藝術可比。

今日的學者文人，已喪失了士人的身分，在社會上逐漸邊緣化而成為某種由他人所領導的專家。整個社會的藝術觀念已經西化，即如少數繼承傳統者，往往也不免僅成為具有一技之長的專家、藝師，或以傳統為個人生命涵養之資。其規模均頗有限，而距離古典培養社會領導人才的精神甚遠。在此情況下，中國傳統的游於藝也就不能不從文明的中心滑落為文明的邊緣，而被社會其他領域以及西方文明所領

導了。

四、餘論：中華學術文化的基本格局與演變

儒學並非僅是一家思想，而代表了中國文明的原型。儒學也非孔子發明，其所論述的種種文物制度，皆是三代沿襲而來的規模，所謂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」。道家或道教則是此文明另一重要的面向，是一種流傳廣遠的信仰，與 Shamanism（薩滿教）以及各地神祀的傳統有密切關係，包括天地自然的崇拜、生前死後的信仰與氣化的觀念等。儒道在祭祀乃至信仰體系上屬同源，後來才分化。政治上領袖群倫的族群文化及信仰，成為儒家，取得官方地位。各地原有的信仰神祀體系，壓在底下，作為道教的基底，而成為流行在民間的信仰。

儒家因長期為官方的學問，故明顯地重視群體關係；而後世的道教則因代表民間社會，看似較為個體化。佛教進入中國後，亦未能占據到政教中心的位置，因此也相對重視個體修練。然而這只是相對而言，心性之學與修行本不可說個體。中國古代各家的思想信仰向來都是個體與群體交融的，而所謂「個體生命化」的意思也並非說修練僅止於個體生命，而是說從自身開始修，而後才推擴出去，入世濟人。

儒家本來的修養方式原是在人與人之間修、在家國天下裏修，此事極難，故常要戒慎恐懼，尤其位置愈高、應事愈繁難，標準愈高。宋儒雖受佛道之影響而重視個體生命的修練，但很有參與政治的條件與意願，故仍重視融入大群體之修養。到了元明以降，讀書人崇尚在野，遠離政治中心，個體生命之修練的成分就更加重了。

中國文明的格局，自東漢以降慢慢發生問題，儒家過去一套政教合一、維繫整體文明秩序的體系已衰，道教意圖建立神國的努力也未能成功，具有更澈底宗教性信仰的佛教因而在此時勃興，給予混亂秩序中的人們一種精神上的重要支撐。宋代本是儒學復興的時代，然宋儒仍每言吾道衰微，足見儒家這樣一套文明原型，自三代以後已難維持過去的飽滿力量，而始終需要道、佛的資源來補充。近世以來三教可謂相互滲透影響，共同支撐起整個文明的發展。但是當遭遇到西方文明的衝擊時，終於還是發現自身文明所培養出來的人物，在心胸格局與整體素養上，存在著根本的缺陷。這些都是不能不重新反省的問題。

近代國人想要全盤或盡量效法西方，但若無希臘、羅馬與基督教的文明根柢，終究無法學得道地。因此今日重新恢復六藝是重要的，這是我們文明的根基與長處，需要研究、更需要實踐。在此基礎上，方能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與文明，並進一步吸納西方文化。就禮而言，社會人倫關係與價值體系在當代華人社會已經分崩離析，亟待重整；就樂而言，則必須回到天、地、人之間的韻律與和諧，重新認識本於性情、應乎天道的古樂精神；射與御能幫助人們養成一種自我駕馭以及對周遭事物負責的能力；書與數則應在上述基礎上，為人們創造更有品質的生活。

此一古典的傳統斷裂已久，當然不易立即恢復，因此今人仍當從近世注重心性與個人修養的傳統上立基，此種「游於藝」雖然不足，卻能藉之上窺古人。若真能明白六藝之精神，則絕不僅僅是為今人增加些人文素養而已，而是要教我們認識天地自然人生之理及自身文化的根本要素，從而體認所以立國之道。我們只有澈底認識自己及西方各自的優缺長短，才談得上互補。中西文化確實是可以互補的，且中華文明法天求道，本具開放接納的性格，能夠將其他文明的優秀質素融會進來，佛教進入中國即是一最好的例子。我們若能朝此方向努力，極有可能創造出更偉大的文明，且使這個文明所孕育出來的人們，有一種高貴的氣質、恢弘的格局以及美好的內在。

（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吳孟謙記錄）